

城乡中小学布局结构变化之路径解析与价值研判

高小强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我国实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十余年以来,发达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结构布局变化呈现不同特征:城市大力推动小班化教育以促进学校内部结构的优化;农村则通过布局调整实现规模化办学的目标。究其原因,发达城市雄厚的经济资本与小班化教育理念有机结合,而落后地区财政困难的现实与规模效益理论互为依托。不可忽视的结果是“小班共识”成为城市拒绝外来务工者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制度屏障,而规模效益理论则成为农村学校维持大班额教学的“科学依据”。农村儿童不论是留守在农村还是迁徙进城市,其教育不公平的境遇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树立城乡一体化的理念,城市推行的小班化教育要具有包容性,而农村学校的布局调整应以小班精神为指引,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才有望实现。

关键词:义务教育;城乡中小学校;布局结构变化;小班化

中图分类号:G6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2)06-0078-07

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实施已逾十年,基础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和优先发展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农村作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难点地区也更加为教育政策制定者所重视。但是,当前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城乡二元格局现状依旧,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城乡之间仍然突出;虽然全国范围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结构与班级规模都发生了变化,但城乡之间所发生的改变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这明显背离了城乡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城乡儿童享受同等意义上教育公平的初衷与理想。

一、城乡学校结构布局变化在路径选择上存在差异

1. 以小班化为目标:城市学校注重内部结构的重建

城市中小学主要以学校内部结构变化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小班化是其具体的实施方案。在我国,最早对小班化教育进行实践探索的是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为谋求与西方发达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小班化教育被确定为上海市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发展趋势,尤其是小学阶段实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1996年秋季,上海市组织专家开展小班化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到2001年8月底上海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宣布,试点经验从2001年秋起在全市普遍推广,3年—5年内80%的小学实行小班化教育。^①可见,上海在推广小班化教育方面确有远见和魄力。北京市从1997年起开展小班化教育实践。到2003年,小班化教学拓展到16个区县的145所学校、819个教学班20300名学生,平均班额不足25人。^②可以看出,从开始小范围试点到制定小学全面实现小班化教学的目标,北京市推进小班化教育的节奏之快、幅度之大堪与上海比肩。继上海、北京之后,我国一些大中城市也陆续加入了小学小班化教育试

收稿日期:2012-05-22

作者简介:高小强,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农村教育。

①顾明. 小班额,大教育[J]. 上海教育,2003,(1):48.

②转引自:梁伟思. 小班教学——21实际基础教育的新趋势[D]. 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3. 5.

点的行列。具体包括南京、天津、青岛、苏州、哈尔滨、广州、郴州、十堰、黄山、平顶山和成都等市。除了大中城市,最近几年,一些发达省份的个别市县也开始在城区内的学校进行小班化教育试点。城市小班化教育的发展具备了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从宏观上来看,小班化教育呈现以发达城市及省会城市为主体并逐渐向非省会城市发展的趋势,在地域分布上则表现为以东部城市为主并逐渐向中西部城市蔓延的态势;从微观上来看,小班化教育以小学初始年级为主有序地向高年级扩展;从领导与实施的主体来看,小班化教育由地方政府自发推动、各自独立地计划和实施。

小班化教育以星火燎原之势逐渐向全国大中城市蔓延,但这种措施是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迁移到城市的现实情境下实施的。大中城市一方面要面对城市户口学龄儿童减少的问题,一方面又不得不应对农村户口学龄儿童蜂拥而至的现实。而在此种形势下城市制定并实施的小班化教育政策一开始并没有考虑到外来学龄人口的要求。从北京市教委 2005 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仍有近 40% 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未获得北京市办学许可的打工子弟学校里就读。^① 尽管北京计划到 2012 年基本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但根据 2010 年的数据,仍有 33% 的随迁子女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而且这样的学校在 2011 年又遭到政府强行关闭,这必然导致一部分随迁子女不得不选择重返乡下读书甚至辍学。^② 相比之下,上海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公办学校里就读提供了较为积极的政策支持,但到 2005 年底仍有近一半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而且随迁子女就读的学校从班级规模来看远远超出了上海小班化教育的标准。2009 年底,在上海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总数为 42 万人,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 36%;共有 92.7% 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在公办中小学校或政府委托的民办小学免费就读。^③ 按照政府的计划,到 2010 年底,所有在沪的农民工同住子女将和上海户籍孩子一样,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在 2008 年确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到 2010 年农民工子女小学阶段 70% 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初中阶段 100% 纳入公办学校就读,剩余农民工子女全部纳入政府出资改造和提供办学成本补偿的合格民办学校就读,^④而这些学校都将以小班化教学为目标。但总体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当前的小班化教育仍然是城市户口的儿童享有的一项特权。小班化教育从制度上为城市户口的学龄儿童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保障的同时,也从制度上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外来学龄儿童公平享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上海的案例给我们以启示,即只有制度壁垒被彻底打破,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 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成效与问题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开始进行中小学布局调整。由于“一村一校”的学校布局已经不再合理,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下,一部分学校不得不接受“撤、转、并、停”的命运。当然,全国范围内新一轮中小学布局调整是在 2001 年 5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公布之后展开的,到目前为止已经走过十年时间。这十年以 2006 年 6 月教育部颁发《教育部关于实事求是地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标志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我们选择从中西部地区到全国,从班额变化到学校规模改变两个层面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加以考察。从学校规模来看,中西部 6 省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前(1999 年)与布局调整后(2006 年)的学校规模比较,农村小学校均学生数由 228 人增加到 295 人,增长了 29.5%;初中校均学生数由 874 人增加到

① 马北北. 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总数 40% [EB/OL].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7/17/content_3330136.htm, 2010-07-17.

② 曹旭刚. 偌大城市为何容不下一张寒门书桌 [EB/OL]. http://hsb.hsw.cn/2011-08/17/content_8136555.htm, 2011-08-17.

③ 仇逸. 农民工子女上学将不为“沪籍”所困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9-12/18/content_12666128.htm, 2009-12-18.

④ 陆静玉. 到 2010 年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将由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小学接纳 [EB/OL]. http://www.sh.xinhuanet.com/gov/2009-02/23/content_15771072.htm, 2009-02-13.

1020人,增长了16.6%;从班额变化来看,调整后(2006年)平均班级人数统计情况小学36人,初中61人,九年一贯制51人。^①就全国的总体情况而言,学校数量方面,2000年—2006年,我国农村小学由44.03万所减少到29.51万所,减少了14.52万所;农村初中由3.93万所减少到3.53万所,减少了近4000所;农村教学点由15.75万个减少到8.76万个,减少了6.99万个。农村小学校均规模由193人增加到226人。^②布局调整使农村中小学数量大幅减少,校均规模扩大,班级规模处在大班额状态。

2006年,《通知》总结了之前布局调整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有的地方工作中存在简单化和‘一刀切’情况,脱离当地实际撤消了一些交通不便地区的小学和教学点,造成新的上学难;有的地方盲目追求调整的速度,造成一些学校大班额现象严重,教学质量和师生安全难以保证;有的地方寄宿制学校建设滞后,学生食宿条件较差,生活费用超出当地群众的承受能力,增加了农民负担;有的地方对布局调整后的学校处置不善,造成原有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流失等”。《通知》要求对以上突出问题进行纠正,这无疑是对已经违背政策设计初衷的布局调整的一次修正。如果按照《通知》的精神重新审视此前的布局调整,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方面都会有所改善。但是,此后的几年全国范围内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速度并没有因此而减缓的事实证明该文件的效力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对2009年和2010年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的整理发现,2009年,农村小学减少到234,157所,比2006年又减少了6.1万多所;教学点减少到70,954个,减少了1.67万个;农村初中减少到22,921所,减少了1.24万所。与2006年相比,2010年,农村小学减少了8.4万多所,教学点减少了2.2万多个,农村初中减少了6613所。对2001年和2009年农村小学班额的变化进行比较发现:人数在25人以下的班级占总班级数的比例从36.85%上升到38.00%,人数在26人—35人的班级比例从25.36%下降到23.50%,人数在36人—45人的班级比例从20.27%下降到19.77%,而人数在46人—55人的班级比例从11.22%上升到11.83%,人数在56人—65人的班级比例从4.45%上升到4.80%,人数在66人以上的班级比例从1.85%上升到2.10%。^③若以《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舍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发[2006]21号文件)中对农村非完全小学、完全小学和初中每班班额分别不超过30人、40人和50人的标准衡量,布局调整之后的农村中小学显然处于大班额状态,与2001年布局调整之初相比没有本质的改变。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区还涌现出不论班级规模还是学校规模都远远超出国家所出台标准的“巨型班级”和“巨型学校”。^④通过重新审视与解读以上数据,可以初步做出以下结论:在农村学龄儿童减少的大背景下,农村中小学通过布局调整一方面扩大了学校规模,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班级规模或至少维持大班额基本不变。

因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农村学龄儿童人数下降的趋势不会改变,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将是一场持久战并且始终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所以,与城市小班化教学作为地方政府的自发行为不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是由国家出台政策,省级政府制定方案,各市、县级政府负责具体实施的国家行为。从其实施的成效来看,布局调整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农村学校的规模效益,促进了区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提高了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⑤可以说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以后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现实性上来看,十年来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作为一项促进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同时也成为维持农村学校大班额教学状态不变的手段。如此

①郭清扬,王远伟.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总体评价[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3):71-77.

②何卓.对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8,(1):35-39.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6年教育统计数据[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659/index.html,2012-07-0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09年教育统计数据[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4958/index.html>,2012-07-03.

④万明钢,白亮.“规模效益”抑或“公平正义”——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巨型学校”现象思考[J].教育研究,2010,(4):34-39.

⑤范先佐,郭清扬.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成效、问题及对策——基于中西部地区6省区的调查与分析[J].教育研究,2009,(1):31-38.

一来,布局调整后所谓的优质资源仍然无法满足农村家长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以城市学校为目标的“移民”和“迁徙”的择校浪潮更加难以遏制。而面对咄咄逼人的随迁子女浪潮,城市小班化教育这场排斥外来儿童的“静悄悄的革命”也很难心安理得地推行下去。比如有的大城市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举措不但招来社会的反思和舆论的谴责,也有农民工家长开始尝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二、城乡“各自为政”的现实原因与价值追求

1. 发达城市雄厚的经济资本与小班化教育理念有机结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发达城市基础教育开始面临新的问题。一是“生源危机”。随着人口政策的实施,城市人口增速减缓(特别是国内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学生“入学高峰”基本已过去。^①与此同时,由于办学体制搞活,兴起了一批民办私立学校,这更加剧了生源问题的紧张程度,一些薄弱学校甚至还面临着“生源危机”以及宝贵教育资源流失的紧迫问题。^②需强调的是,这种“生源危机”主要指的是城市户口学龄儿童的减少,并未将外来务工者子女考虑在内。二是城市传统的大班教学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人们的要求,逐渐富裕的市民对优质教育、高品位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针对以上问题,发达城市在理念和实力上都具备了予以解决的可能性。首先,从20世纪初期萌芽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小班化教育理念在21世纪初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改革的主导思想。小班化教育理念在中国发达城市也逐渐扎根发芽。理论界也普遍认为在当前的教育形势下,随着小学入学人口的降低,实行小班化教育是实现以学生为主、因材施教的有效形式,是实现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可以说,作为实现素质教育的途径,小班化教育理念在促进城乡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都是可取的,但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小班化教育是一种高投资的教育模式,要达到小班化教育理念所要求的标准,必须有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强有力支持。所以,发达城市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地方政府在基础教育投入上的强烈意愿是小班化教育得以进行试验并逐渐推广的根本保障。小班化教育理念与充足的地方财政的“联姻”成为发达城市解决“生源危机”和满足市民对优质教育强烈需求的自然选择。

2. 欠发达地区财政困难的现实与规模效益理论互为依托

和发达城市相比,我国农村教育则面临着三方面的问题:生源问题,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需要,财政问题。如果说农村教育遭遇的前两个问题和发达城市遇到的问题有较大的相似性,那么第三个问题则为农村地区所特有,这对于农村教育而言则成为核心症结所在。因为在“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确立后,县财政在客观上不得不对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事实仍难以改变。因此,县及县以上政府希望通过布局调整提高效益。县教育部门同样面临着来自县其他部门的压力,于是布局调整就成为一种自然选择。^③2005年12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意味着农村基础教育在经费保障的水平上有了提高。新的基础教育财政改革提高了义务教育经费中来自财政拨款部分资金的水平和分配的公平程度,那些改革前获得财政拨款资金较少的学校在改革后财政拨款明显增长。然而,不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改革对于经费总量却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④所以布局调整的问题就演变为地方政府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总量上极其有限甚至匮乏的教育经费的问题。同时,布局调整也为财政匮乏或紧缺的地方政府提供了规避追加投入的责任的可能性。

农村教育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尤其是第三方面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不可能自发地效仿发达城市所采取的改革方式;同时,即使采取了布局调整的方式也无法按照国家政策设计的初衷

① 吴晓玲. 走向小班化教学——从“形”至“神”践行历程[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3. 6.

② 这些论述基本符合这一时段的现状,但仍需强调的是,这种“生源危机”主要指的是城市户口学龄儿童的减少,并未将外来务工者子女在城市当中的真实存在考虑在内。

③ 郭建如. 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教育政治学分析[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70-79.

④ 孙志军等. 义务教育财政改革:增量效果与分配效果[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84-100.

进行。正如前文所说,布局调整的问题转变为地方政府如何规避、降低或者转嫁教育成本的问题。县乡政府受到来自中央及其他上级政府压力时,有可能逃避责任,把这种压力向社会转嫁。这些代价更多地由处于弱势地位的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承担。学生的上学成本增加,^①不仅包括经济成本,还包括身体成本、生理成本、心理成本以及社会文化成本等等。另外,布局调整后的中小学多数实行寄宿制,使学生既缺少家长监管,又在失去了以往低成本上学的可能性的同时无法确保得到高质量的教育。于是,外出务工的家长更倾向于将孩子带到城市上学。如此一来,布局调整竟成为孩子随父母进城读书的推手之一。当然,布局调整政策的实施也需要相关理论的支持。同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但至今仍备受争议的“教育规模经济”或“教育规模效益”理论成为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事实证明,“规模经济理论”或“规模效益理论”有其可取之处,但前提是“学校规模适度”。即在教育的其他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学校拥有恰好可以使所有资源得以充分和恰当利用,并在不违背教育规律的前提下,保证培养规格、教育质量不受影响的合理限额的班级数和学生数。因为规模太小,不能充分和适当运用教育资源,产生单位学生成本偏高的不经济效果;规模太大又会衍生人际关系冷漠、行政僵化、学生对短缺的教育资源的不充分享有等不经济因素。^② 学校适度规模并不是一种主观判断,而是结合地方教育现实进行综合和科学论证的结果。然而在政府主导的布局调整过程中,各级政府普遍理所当然地认为学校规模增大,每所学校可支配的教育资源增加,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整体得到提高就会形成规模效益。使得区域内客观存在的差异被搁置,理想的愿景置换了理性的判断;“一刀切”的运动化模式取代了因地制宜的精细化操作。结果是出现了3位教师6个年级140多学生的“小班额”,明显不健全的小规模学校和大班额、“巨型学校”并存的局面。^③ 可以说,匮乏的地方财政与“规模效益理论”的“合谋”是造成畸形学校出现的根本原因。值得警惕的是政府主导的布局调整对规模效益的追求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规模的扩大,还渗透并扩展到了班级当中。

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城市小班化为参照,农村中小学生在农村接受教育,则是现行的教育不公正的直接受害者。因为布局调整并未改变他们继续接受大班化教学的命运;如果他们进入了城市,对于现有的更为公正的城市教育而言,他们一方面成为城市户口儿童可能的不公正教育的“麻烦制造方”,因为即使是发达城市,其教育资源最多也只是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如果正视农村儿童在城市存在的现实,他们又是城市总体性的不公正教育的受害方,原因在于城市小班化教育是一种将非城市户口儿童排斥在外的制度设计。总而言之,对于农村儿童而言,不管其选择“留守”还是随父母“迁移”,教育公平的程度尤其是起点公平的程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有所提高。^④ 相反,这种源于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使不平等得到了最大化保持。

三、城乡中小学布局结构优化的“中庸之道”

1. 城乡一体化对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

整体思维要求我们将教育改革中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细节都置于整体的社会生态与教育生态的现实背景下,置于历史和当下共同构成的教育改革时空背景下,从而对教育改革做出定位和属性的诊断性分析。^⑤ 有一种观点认为,就义务教育而言,由政府主导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般有先外延后内涵的过程,以外延条件的改善打基础,以内涵质量的提升促质量。因而可以说,内涵性均衡是义务教育均衡发

① 郭建如. 国家——社会视角下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教育政治学分析[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70—79.

② 姚永强. 基于规模经济视域下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J]. 现代教育科学,2009,(3):1—2.

③ 笔者在西部农村调研过程中发现,有一所没有被撤并的小学里有6个年级140多学生,如果单从班级人数来看可以说是小班额,但是因为学校只有3名教师,这样的小班额显然与小班化教育的要求相去甚远。而且类似的学校在当地不只一所。同时我们发现,另外一些非行政村的教学点则是学生少而教师更少,这些通常采用复式教学的教学点根本难以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小班化教育。

④ 贾勇宏,曾新.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对教育起点公平的负面影响——基于全国9省(区)的调查[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143—153.

⑤ 叶澜.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25.

展的更高阶段,是对外延性发展边界的突破和深入,也是外延性均衡发展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内涵性均衡能否顺利实现,是衡量义务教育质量水平和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①但是,这种合理的观点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会被转换为先城市后农村的习惯性发展思维,即城市和农村基础教育依旧以“单轨单车”的模式各自独立发展,最终结果是难以实现整体的教育公平。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思维包含着视城乡教育为统一整体的含义,在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的现实背景下,我们必须面对两个事实:一是城市排斥农村儿童的小班化教育会受到更大的挑战,二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将持续进行。城乡教育一体化以及教育均衡发展要求基础教育改革要改变城乡二元独立发展的现状,目前最为现实和紧迫的任务是将已有的这两条轨道对准同一个目标进行有效矫正使其达到平行,即对城乡二元思维下产生的制度进行改造甚至重建。因为“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②。只有基于正义原则的制度重建与实施,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的列车才可能在平行的双轨上驶向共同的终点。

2. 城市需要涵盖外来儿童的小班化教育改革

我们相信,当有一天城市学龄儿童的短缺已经让城市小班化教育都无法正常实施以至于出现整体性城市教育危机的时候,被排斥在外的农村户口儿童就会成为挽救危机的救命稻草。但是,如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只能等到那一天才可以享受到小班化教育的优惠,那么当下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均衡发展以及教育公平的理念就失去了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城市应当为随迁的农村学龄儿童提供公平的教育,即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小班化教育,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排斥外来儿童。一方面,城市教育的蛋糕应当进一步做大,既不能有损于现有城市户口儿童的利益,同时也要给外来随迁子女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这才是城市治理者应当主动去面对和化解的难题。上海由政府出钱收购和开办打工子弟学校,保证外来务工者子女无障碍入学,广州为外来工子女提供公办校入学名额,北京在关停农民工子弟学校后出台以公办学校为主体的分流安置方案,这些还只是程度不同的尝试,但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与城市儿童相同质量的教育无疑创造了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能够包容外来人口的小班化教育则是发达城市努力的目标。

3. 农村应在“小班精神”指引下进行学校布局优化

在农村,布局调整运动的惯性还在,大班教学的思维与现实犹存。如果布局调整依然为达到所谓的规模效益而继续维持大班化教学和制造巨型学校,农村儿童就永远无法享有和城市儿童一样的教育公平;如果当前由国家制定的布局调整政策得不到有效的修正,农村地区地方财政的匮乏与规模效益理论的“合谋”的现在有限的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首先是国家层面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以城乡教育一体化以及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为宗旨的反思、改造甚至重建。在具备更为合理的制度保障的基础上,针对农村教育的具体现实和特殊困难,可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加大投入,积极保障小规模学校的健康发展。由于受规模效益理论的影响,地方政府对于小规模学校持有非常矛盾的心态。即保留小规模学校违背规模效益理论,但出于因地制宜的考虑,一些地方又不得不适当保留小规模学校。受此心态影响,在优先保障规模化学资源配置的情况下,小规模学校的教师配置和资源配置都难以得到保障而处于艰难维持甚至自生自灭的困境。所以在适当保留小规模学校已成为农村中小学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小规模学校的健康运行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第二,继续进行的布局调整应当以实现小班化教育为目标。布局调整之初,学生减少导致班额缩小本应当转化为农村在布局调整的同时实施小班化教学的契机,但是以规模效益为目标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却扼杀了这种可能性,致使农村学生失去了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在新的阶段,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的力度,布局调整应当从维持大班额不变的思维转变为积极推进农村中小学小班化实验。具体而言,对于因学生流

^①刘耀明,熊川武.论义务教育内涵性均衡发展的边界[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1):36-40.

^②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失而自然形成的小班应该积极尝试小班化教学,而不是通过合并人为地继续制造和维持大班;对于现有大班额学校,则应当进行小班化改造。

上述措施看似简单却是系统而繁杂的工程。但是为实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宏伟目标,不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法回避。尤其是在2006年以来国家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并逐步完善以及为确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如期实现而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的大背景下,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和满足现代化新学校建设的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应当而且必须以重大的历史责任感、足够的远见和魄力去正视问题,促进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

Value Judgment and Path Analysis of Structural Changes in Urban and Rural Schools

GAO Xiao-qiang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round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structural change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have taken o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eveloped cities and rural areas. To optim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governments in developed cities have been vigorously promoting small class sizes. As a result, however, these urban schools may turn down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Meanwhile, the authorities in rural areas have increased class size to achieve economies of scale. Consequently, the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for rural children remains essentially unchanged, whether these children stay in the country or migrate to cities. Urban schools, while striving to reduce class size, should be more accommodating to migrating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rural schools should be oriented toward reducing class size.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goal of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e attained.

Key words: compulsory education; urban and rural schools; structural changes; small class size

(上接第54页)

To Cultivate the Thinking Ability and Seize the Strategic High Groun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Talent

——Implications of DK Education's "2011 China SAT Annual Analysis Report"

PAN Yong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This paper reflects upon and diagnoses Chinese SAT test takers' performance in critical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writing, by analyzing the "2011 China SAT Annual Analysis Report" released by DK Education, an SAT tutoring center.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data in the report reveals that Chinese students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meet the academic education standards, reflecting a serious crisis in Chinese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and expressive power. The paper advocates Chinese education innovation in three areas: education evaluation, talent evaluation, and purpose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at is, education evaluation should turn from "the past tense" of the post-figurative culture to "the future tense" of the pre-figurative culture; talent evaluation should turn from all-round development to initiative taking; and the purpose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hould turn from a focus on knowledge to a focus on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Key words: SAT; DK Education; competition for talent; cultivation of thinking ability